

#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

## 王季思自传



我一九〇六年一月出生于浙江温州永嘉县乡区的上田村，学名叫王起，季思是我的字。

温州是我国宋元南戏的发源地，长期以来就流行昆腔、乱弹、高腔等戏曲。即使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自然

村，每年也有二三次社戏的演出。连合邻近几个村子，有的人一年可以看到十几次的戏。演出社戏，是那时农村唯一的文化娱乐活动，每当戏班子进村，我们这些小孩子就象过节一样的高兴。夜空、明月、树影，空气清新得象一层透明的纱，那刺目的煤气灯光、戏台上载歌载舞的小旦、机灵活跳的小丑、八面威风的宰相、仗义救人的侠士，至今仍在脑海中留有印象。鲁迅先生的《社戏》，我是很久以后才读到的，我的心完全沉浸在那朦胧恍惚的意境里，好象自己又回到了童年故乡的夜晚。

每次演出后，我和村里的小孩子就削竹枝作刀枪，插菖蒲作翎子，模仿戏台上的武打；而村中的大姑娘、小媳妇则三三两两议论那嫌贫爱富的员外相公，守节尽孝的善良妇女，那情景，真象陆游

诗中说的：“满村听唱蔡中郎。”日浸月染，农村中劳动人民所表达出来的朴实浓厚的爱和憎、直和曲，无形中进入了我的头脑，可以说他们是我学习古典戏曲的启蒙老师。同时，这“戏台小天地”，也使我看到了许多在封建家庭里所看不到的社会现象。

我老家藏书较多，小学时就读过《论语》、《孟子》、《诗经》、《左传》，也背过不少古近体诗，私下还偷偷看过《西厢记》、《红楼梦》等戏曲小说。我在父亲和塾师的正统教育下，相信“四书五经”是教人立身处世的好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正道。而象《西厢记》、《红楼梦》等戏曲小说，则是闲书，偶然拿来消闲还可以，多看是要坏人心术的。

我从小爱读白居易新乐府诗。在乡下，我有一些童年小伙伴，一有机会，我就和他们在—块，学唱民间歌谣。也许正是这样，才播下了我后来爱写乐府民歌的种子。

“五四”运动时期，我在浙江第十中学读书，从《新潮》、《新青年》等刊物里接受了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和平民文学的观点，这才不把《西厢记》、《红楼梦》等戏曲小说当闲书和坏书看，还能以同情的态度对待书中主人公的不幸遭遇，这是我从封建思想牢笼里跨出的第一步。

“五四”运动鼓动了青年人的爱国热情，我和同学们上街宣传反对“二十一条”，劝大家不卖日本货。当时十中的校长、学监都是去过日本的留学生。他们反对我们这样做，我们私下骂他们是“东洋货”。中学毕业的前一年，有一次我在课堂上削铅笔，笔芯老是被削断，学监巡堂看见了，说我不用心听课，我举起那断头的铅笔说：“你看，这是东洋货，一碰就断。”邻座的同学忍不住一齐哄笑起来，他白了我—眼走了。到了这年暑假，校方就以“操行不端”为名，通知我退学。我只好转去瑞安县立中学读书。瑞安地方比较偏僻，读书风气却很盛。当时清末著名学者孙诒让（仲容）先生的

家也在瑞安，由于我家和他有一点亲戚关系，得以寄住孙家。其时孙先生逝世未久，他的玉海楼留有极其丰富的藏书，有不少是他的批校本，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生活中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偶然的一点机缘就能决定或者改变一个人生活的道路，关键在你能不能正确地把握住它。孙先生家里的大量藏书和一些手稿、手校本，以及他在学术上的通信（如孙先生和俞樾的通信），在我这个无知的少年面前，象突然打开的知识宝库。生活竟是这样安排了我，倘若十中没有开除我，我就不会来到瑞安；而要是我不接触这些藏书，那么我也就学不到一些整理古代文献的方法，即一般所说的“校勘考证”之学。后来我校勘《西厢记》、《录鬼簿》的不同版本，考证元人杂剧的特殊用语，最早就是受孙氏的启发的。

回头想想这件事，使我明白了两点道理：一个人在生活中受到挫折和打击，并非完全是坏事，在逆境中往往能取得在顺境中意想不到的成绩；同时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不要抱怨环境恶劣、条件不好，实际上，只要自己有明确的方向，肯努力学习，充分利用现实中的有利条件，就一定有所成就。

一九二五年，我到南京东南大学中文系学习，主讲《词选》、《曲选》课的吴梅先生，是辛亥革命前后的文学团体南社的成员，多才多艺，会填词、写戏，还会唱戏，会订谱，收藏戏曲的丰富，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吴先生虽不擅长于课堂教学，但善于发现学生的长处，加以鼓励。记得有一次作业，他居然在我的卷子后批道：“自万里（原北京图书馆版本学家）、宇霆（原陕西师大教授）、维钊（原杭州美术学院教授，书法家）去后，复得斯才，我心喜甚。”看到这一批语，我受宠若惊，感到极大的振奋。鼓励多于批评，对青年人是有好处的。青年人大都有一顆向上的心，自尊心也较强，批评过多，容易挫伤他们的上进心，使他们看不到自己的长处。吴先生的身

传言教，一直影响着我后来对青年的态度。

我也有过教训：吴先生为了让我们懂点戏曲的音律，曾教我们唱昆曲。吴先生吹笛，我们按谱跟着唱。可是我一唱不行，就不愿再唱了。我后来搞戏曲，对宫调、音律都不甚了了。至今想起，还深以为憾。

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浙江、安徽、江苏好几个中学里教书。利用课外的零星时间，札记金元戏曲的特殊用语，考查关汉卿、王实甫、高则诚等作家的生平和《西厢记》、《窦娥冤》、《白兔记》等故事内容的演变，准备为比较全面地研究我国戏曲的历史发展打下一点底子。

正当我把批注在《元曲选》、《六十种曲》上的部分考证资料分门别类地集中起来时，抗日战争爆发了。我当时在松江女子中学教书，逼近上海。经三个多月激战，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松江就要沦陷。我只得忍痛抛弃了多年节衣缩食所购置的图书和起早摸黑所摘录的资料，离开松江女子中学，带着一部暖红室刻本《西厢记》和一部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元曲选》南归。

抗战初期，我为抗敌救国宣传，也为一家衣食奔走，生活极不安定。后来到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任教，为了教学需要，又整理了些戏曲小说资料。接着出版了《西厢五剧注》。当时还有人视《西厢》、《红楼》为坏书，写诗嘲笑我：“不读六经看五剧，西厢浪子是前身。”用意很明白：你是搞《西厢记》的，不配在大学里教书。

在这重重阻力面前，我也有过迟疑、动摇，但终于还是拖着沉重的步子跨过来了。“汉宋诸儒语太酸，六经日对古衣冠。一般饱暖思淫欲，又检《红楼》说部看。”这是我当时对那些封建卫道士的答复。

抗战胜利后，我随浙大分校迁回杭州。为了考证金元杂剧特殊用语的渊源，撰写金元以来戏曲作家的传记，我利用浙江图书馆

的藏书，翻阅了大量通俗文学作品和宋元笔记小说。我在浙大分校讲过中国文学史，这时初步认识到：一、从宋元时期发展起来的戏曲、小说，比较投合城市平民的胃口，跟封建士大夫的诗文是两类东西。它为“五四”运动以来的白话文学开了先路，我们今天研究古典文学，应该把更多力量放在这些作家作品上。二、戏曲小说的用语，多数来自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比之从先秦诸子经传沿袭下来的文言文要通俗得多，也生动得多。向来由于学者对小说戏曲的歧视，没有对这些作品的词汇、语法，下一番训诂、考证、整齐划一的功夫。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应该象王引之、俞樾、孙诒让等研究先秦诸子经传那样，对宋元戏曲小说的用语，集中句例，沿流溯源，先逐个解决疑难问题，然后进一步从中找出一些共通的条例来。

戏曲是带综合性的学科，它是文学，又是艺术，直到今天，我还不愿脱离当前的舞台演出来研究古代戏曲作品。在东南大学读书时，我和一些爱好文艺的同学在闻一多先生指导之下组织春泥文艺社。我认为我们自己的戏曲遗产如此丰富，欧洲和日本的戏剧作品又源源而来，如能融会贯通，利用舞台作通俗宣传，对振奋人心、挽救祖国，当不无效果。当时春泥社的同学陈楚淮喜欢写话剧，方玮德、陈梦家喜欢写新诗，我也写过一点话剧、新诗，这对我后来的戏剧研究工作和诗歌创作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在几十年的旧社会里，那些痛苦的经历就象毒蛇一样咬啮着人们的心，也深深激动着我。我曾夹杂在流亡逃难的人流中，目睹了国民党军队抢杀白发苍苍的无辜菜农；目睹了瓯江大水暴发时灾区人民的惨况；目睹了保育院里弃童的尸体为野犬所撕解……。这苦难的中国大地，促使我拿起笔，写下这人间的丑恶和不平。民族深重的灾难，个人生活的激变，不时促使我从古书堆里抬起头来，利用民歌、乐府体裁来写诗。记得抗日战争快结束时，我曾抄

了二十多首诗寄给昆明西南联大的浦江清教授（他是我东南大学的同学），请他转给朱自清、闻一多两先生看。后江清回信说，他们都看过我的诗，表示欣赏。闻一多先生还要他转告我：最好纯用乐府民歌体，走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道路，可以开一风气。

这二十多首诗后来都收集在《王季思诗词录》里。每当我看到这些诗，就象是做了一场恶梦。揭露黑暗，是为了追求光明。它使我珍爱新中国为我们展开的光辉前景，痛恨这十年动乱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和它的种种后遗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我政治生命的新起点，也为我的学术研究工作展开广阔的前途。我一面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力图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指导之下，探索我国戏曲小说的历史发展情况；一面参加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的活动，看了不少戏曲、话剧、电影，为它们写评论，力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

值得纪念的是，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三年，我在北京四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每一次都给我极大的鼓舞。一九六〇年，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我幸福地聆听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周总理以自己长期参加革命斗争的切身体会，启发我们怎样克服旧的思想意识和作风，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生活关、家庭关和社会关，要求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相结合。正是在我们党老一辈革命家的教导下，那几年里，我除教学工作外，还写了不少戏剧评论和学术论著。当然这部分论著肯定也存在缺点和错误，那是属于学术上百家争鸣的问题，可以通过同志之间的批评、讨论逐步解决。我当时和陈中凡先生关于《西厢记》作者问题的讨论，就是根据这种精神展开的。

在学术研究工作中，我认为有两点相当重要，其一是抓有关问题的原始资料，抓有关问题的最新成就。抓住了这两头，一些中间过程的东西就容易弄清楚。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明白什么问题已

经解决，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在研究问题时才能重点深入，在前人已达到的水平上有所突破；在行文时才能做到“略人之所详，详人之所略”，给人以面目一新的印象，而不会叫人看了昏昏欲睡。我开始阅读元剧时，直接受吴梅先生的指导，又认真学习了王国维先生的著作。吴、王两先生的论著是代表当时这门学问的最新成就的。我在中学时期只看到金圣叹批本的《西厢记》，听了吴先生的话，才知金本不大可靠，去借暖红室刻本的《西厢记》来看，顿觉眼界大开。我原来受金圣叹的影响，以为《西厢记》第五本是关汉卿的狗尾续貂，对关氏毫无好感。读了王先生的《宋元戏曲史》，书中推关氏为元人第一，这才仔细阅读了关剧，为后来写关剧的论文打下了基础。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随着历史的前进，用当时先进的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五四”时期，我如果不接受民主、自由的思想，重视平民文学的作品，我决不会把许多精力花在戏曲、小说的研究和民间歌谣的学习上。全国解放以后，我如果不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来指导教学研究工作，我将不可能在原有基础上前进一步。拿我自己解放前后写的论著对比，就分明是两种不同境界的东西；拿我和前辈学者吴梅、王国维先生对比，也能看出有明显的差异，即我的论著比较注重作家时代背景的研究与作品思想意义的阐发，因而对古代戏剧作家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能作出较为科学的分析。有人认为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这些都是“虚”的，学不学都一样，我看不见得。

一九六一年，我接到高教部的通知，到北京和兄弟院校的同志合编《中国文学史》（四卷本）。中山大学中文系还单独接受编写《中国戏曲选》的任务。一九六四年，《中国文学史》出版，《中国戏曲选》也确定选目并编好上册。过了两年，十年动乱的恶浪就把我们教研组预定的一些集体科研项目冲了个一干二净。我个人解放后

十几年来积累起来的图书、资料、讲稿也大量丧失。这是我从抗战初期松江沦陷以来，在学术研究工作中的又一次重大挫折。

我做了几十年的教师，深知师生关系的重要。师生之间的感情不融洽，想“传道、授业、解惑”，那是不可能的。我在东南大学时，吴先生就没有一点教授架子，他丰富的藏书也允许学生去翻阅。其中有些经过他批点的本子，对我们启发更大。现在有的大学教师，却不大愿意和学生接触，这一点必须改进。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师生关系是冷冰冰的金钱关系，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型大学，师生之间应该更温暖，更亲密，还应该有新的思想基础。

回顾自己的一生，虽然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戏曲史的研究，略有所得，但质量数量，两皆平平。从一九五八年和苏寰中、杨德平合作整理《桃花扇》开始，直到去年我和十几个兄弟院校的同志合作编选《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止，我解放后的论著，大部分是跟中青年同志合作的。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我那么喜欢和年轻人合作？这使我想起龚自珍的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一个民族的学术文化，如长江大河，总是后浪推前浪，奔腾不断地前进。新一代总是要取代我们的事业的。通过这种合作，既使我们老一辈的论著较好地体现年青一代的要求，同时也将我们老一辈的所学在具体工作中传授给年轻一代，使他们青胜于蓝，后来居上。所以，尽管有不明个中原委的人对我的做法猜疑议论，我却至今不悔。

我今年已经七十六岁了。岁月无情，精力有限。林彪、“四人帮”已经使我们空度了十年时光，我必须尽快把时间抢回来。与中青年教师合作，发挥集体的力量，将可以较快、较多、较好地为社会、为人民留下一点精神财富。中文系潘允中教授为我题了一联：“青春有志须勤学，白发无情要著书”，正道出了我这方面的想法。

我自一九二九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中文系，此后即长期在浙江、

安徽、江苏三省任中学语文教师及大学中文系文学教席。解放三十多年来，对学科的发展，我并没有多少贡献，可是党和人民却给我很大的信赖。过去我一度兼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现在仍担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又被推选为广东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副主席，民主同盟广东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大百科全书戏曲卷分编委副主编这些工作都是我所难于胜任的。

为了完成这些既定的工作任务，必须要有健康的身体。虽然年迈，但我每天早晚仍坚持户外活动，有时慢跑，有时打太极拳，偶然也到网球场挥拍几下。我们老一辈文化人也并不都是书呆子，不少人还保持了对生活的热情和广泛的爱好。我曾经是网球爱好者；山东大学中文系肖涤非教授也是前清华大学的足球后卫，当时还被一些球迷叫作“萧条非”；一九六二年暑假，我在北戴河度假，还看见北大中文系游国恩教授下海游泳，那时他也是六十岁的人了。我始终认为，没有好的身体，是不能长期从事艰苦的学术研究工作的。

在这份自传结束前，我想起了人们习惯的比喻：教师和他们的工作，就象是一支蜡烛，烧尽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是很喜欢这个比喻的。有时我想，我如果真是一支小小的蜡烛，那该多好！

（师颺执笔）

## 附 记

这份自传是我的助手师颺同志根据我所提供的材料帮助我写成的。他还访问过别的同志，结合自己的一点体会来写，我看还比较符合实际，就让它发表了。问题是传文对我过去走过的弯路，如在学术工作中的贪多务博，主次不分；在十年浩劫中的随风俯仰，

缺乏定见等，没有指出。尤其是我到大学教书后，安于书房生活，脱离广大群众，反映现实的诗歌与散文越来越少写，这是应该作为切身的教训来向读者说明的。

王季思

一九八一年九月

### 附：王季思著作目录

- 越风(诗集) 金华国民出版社 1940年  
西厢五剧注 龙泉龙吟书屋 1942年  
西厢记(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4年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5年  
桃花扇(校注) (与苏寰中、杨德平合作)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年  
关汉卿战斗的一生 人民日报 1958年  
新红集(戏剧评论)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60年  
中国文学史(四卷本) (与游国恩、萧涤非等合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年  
王安石诗文选 (与潘允中等合作)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5年  
评注聊斋志异选 (与黄天骥等合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年  
玉轮轩曲论 中华书局 1980年  
元杂剧选注 (与苏寰中等合作)北京出版社 1980年  
元散曲选注 (与洪柏昭等合作)北京出版社 1981年  
王季思诗词录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玉轮轩古典文学论文集 中华书局 1982年